

【学术动态】

20世纪以来乡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程 伟

乡试是科举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对金元以来中国朝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风俗等方面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30年代起，现代意义上的乡试研究渐自兴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学术界已经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或层面展开广泛的研究，取得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于问题重要、牵涉面广，对后世影响深远，乡试研究正在成为科举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研究的新热点。在中国科举制度停废110周年之际，对乡试研究的发展过程做世纪回顾与反思，就其演进趋势进行展望，颇具学术价值和特别意义。

一 乡试研究的萌芽与发展

总体而言，乡试研究是随着整个科举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而逐步展开的。真正用科学眼光对科举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①，对乡试进行研究则始于30年代。故此将乡试研究置于科举研究的发展背景下，以乡试研究的发展过程为顺序，大致可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至1979年，是为乡试研究的萌芽期；第二阶段，1980年至今，是为乡试研究的发展期。

（一）乡试研究的萌芽期

这一时期由于清末科举革废的激愤余波尚在，现代意义上的科举研究也刚刚兴起，乡试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过多的关注，其研究成果显得相对不足。

民国时期则尤显冷落，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仅有两部科举研究的学术著作涉及乡试。其一是章中如1931年出版的《清代考试制度》一书。该书上卷简要介绍了清代文武科乡试及举人大挑制度，下卷对包括乡试在内的整个清代科举考试科目、规制要求以及八股文的文格与文法做了简要介绍与分析^②。其二是邓嗣禹1936年由国民政府考试院印行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该书在第三章中对辽金的府试（实质相当于其后的乡试）和元代乡会试的历史沿革、考试规程、士人的出身与待遇分别做了简要的考述。在第四章中对明清两代乡试的历史沿革、考试程序等也分别进行了简单的论述^③。

1949年至“文革”结束，大陆将科举视为帝制时代反动的取士制度，基本上采取批判的态度，很少有专门的研究^④，乡试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此阶段仅有两部科举著作和一篇论文涉及乡试。其中最有分量的首推商衍鎏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该书第二章对清代乡试的定制、场规、考法、考官、闱官、中额、试卷磨勘、举人复试、举人入仕的途径及乡会试科举录等做了较为详尽的考释。第七章分别对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源流、文体、题目、变化盛衰等做了较为全面而专深的研究^⑤。商衍鎏作为清代末科探花，其著述不仅学术性极高且可信性较强，为后世乡试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础。另一部是由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张晋藩和邱远猷编写的普及型读物《科举制度史话》，书中第三部分对乡试舞弊与防弊及科场案做了简要的介绍^⑥。吴晗《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一文，描述了明代秀才参加乡试的整个考试过程及中举后的社会效应，并介绍了包括举人在内的整个明代士绅阶层享有的种种特权^⑦，使读者对明代乡试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与认识。

这一阶段港台地区和海外科举研究虽极为活跃，但乡试研究成果并不丰富。1935 年在巴黎出版过一本关于清代乡试的专著^⑧。台湾出版的 19 部科举著作中仅有 4 部论及乡试，其中最有分量的当属齐如山的《中国的科名》，书中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举人的考试情形、中举后的种种活动、举人的晋身出路、举人和乡试名称的演变、举人在社会中的情形等^⑨。该书虽非专门的学术著作，但作为科举时代的过来人，将其所见所闻形诸笔墨，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为后世了解举人科名多了一个直观的视角。沈兼士编著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分别对元、明、清三代乡试制度做了简单的介绍^⑩。黄光亮的《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⑪和刘兆瑛的《清代科举》^⑫均为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专书。两部著作都辟专门章节论及乡试制度，对清代乡试做了相当程度的研究。香港地区，1966 年出版了《秀才·举人·进士》^⑬一书。该书是清末进士出身，曾任台湾代理考试院院长贾景德的一本回忆科场旧事的小册子。此外，香港学者 Adam Yuen-Chung Lui 用英语发表过一篇有关清代乡试的学术论文，对清代早期乡试内容的演变做了简明地勾勒，并十分精到地论述和分析了清末八股文的存废及其动因^⑭。1946 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出版《科举》一书，对中国明清乡试的考试日期、考官派遣、考试场所、考生答题、乡试揭晓、举人恩荣、考试舞弊、考试逸闻以及乡试中式的因果报应等做了简要描述。1963 年他对该书进行订正和补充，并加“中国的考试地狱”的副标题再次出版^⑮。

综观以上研究可知，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 1949 年至“文革”期间，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地区，抑或海外，乡试研究成果不但数量有限且少见专门的著述，研究也多为制度的考证、事实的描述和史实的回忆，缺乏问题研究和理论探讨。

（二）乡试研究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经过“文革”期间科举研究的空白之后，中国大陆科举研究开始复兴繁盛，研究中心已回归本土^⑯。乡试研究也随之由第一阶段的冷寂开始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20 世纪最后 20 年，乡试研究已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近 20 部科举著作论及乡试。总体来看，这些著作主要是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研究，书中个别章节涉及乡试研究，仍以制度考证为主，但已经出现了有关直省乡试的实证研究和与乡试相关的专题研究。其中，王德昭、张希清、刘海峰、庄明水和李铁等学者的研究颇具有代表性。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对清代乡试的考试过程、考试方法做了简要的介绍，对明清两代包括乡试在内的科举制度的演变过程，明清乡试之异同的研究颇为详尽^⑰。张希清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中对自唐后乡（解）试考试机构及考官、应举人资格，元明清三代乡试中额、考试地点、考试时间、报考手续、考试规则、试卷评定、中举及第与授官等进行了研究^⑱。该书因重制度演进的考察，时间跨度大，论述略显简要。刘海峰和庄明水主编的《福建教育史》是这时期有关直省乡试研究的代表性著述，该书第三章对元代福建乡试中式人数和第一名人数（相当于明清时期的解元）做了严谨的考证。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明清两代福建乡试中额的演变及在全国的位次、历科福建举人数和解元数，以及清代福建乡试考官做了严谨的考证和统计，并统计分析了明清两代福建解元和举人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⑲。李铁的《科场风云》虽是一部讲述科场逸闻趣事的通俗读物，却较为全面地对清代顺天、江南、河南、山东等省乡试科场案进行了综述^⑳。此外，这一时期还发表 10 余篇有关乡试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多是有关乡试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清代乡试回避制度、乡试考官、乡试科场案，元代乡试制度等^㉑。

进入 21 世纪，在科举研究整体繁荣的大背景下，乡试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迄今为止，涉及乡试研究的科举著作已有 20 余部，虽然大多还是在研究整个科举制度时个别章节论及乡试，不过已经出现乡试研究的专著。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大量有关乡试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数量已达 100 多篇，其中不仅有与之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还有以之为题的硕博学位论文。相对于前一阶段，第二阶段的乡试研究无论在成果数量还是深入程度上都取得较大的进展。虽然多数研

究依然停留在制度的考释和史实的叙述阶段，但已有相当学者不再局限于制度史的研究，开始关注乡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视乡试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研究成果。

二 乡试研究的重点与侧面

作为一个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乡试研究空间十分广阔，呈现多学科研究的特点。如前所述，乡试研究进入新世纪获得了迅速发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的论著，就其研究主题和主要观点做一介绍。大体而言，目前乡试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省乡试和区域举人研究

目前，这一主题较之其他主题研究更为深入系统，研究成果多为硕博学位论文。姜传松、刘一彬、张森、赵娜、程伟、田书清、刘希伟、许静、尹芳芳分别对清代江西、福建、顺天、河南、贵州、江南、山东、湖南直省以及元代江浙行省的乡试做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②；丁蓉、申礼、王红春、程小丽分别对明代南直隶、开封府和明清浙江省举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③。此外，刘海峰、杨齐福曾对清代台湾举人及其与福建乡试的关系做过十分专深的研究^④。其中，以姜传松、刘一彬、张森、程伟、田书清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是第一篇系统研究清代江西乡试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分别对清代江西乡试中额、江西乡试闱官、江西乡试科场案、江西解元与举人的地理分布、江西贡院和清代乡试鹿鸣宴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专门研究。该论文已经付梓出版，是首部研究清代直省乡试的著作^⑤。刘一彬《闽台交融的考试纽带：清代福建乡试研究》、张森《清代顺天乡试研究》、程伟《清代河南乡试研究》、田书清《清代贵州乡试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不但对清代福建、顺天、河南、贵州4直省乡试做了全面系统研究，还各自对本省乡试的特色进行了充分挖掘和深入探讨。

（二）举人和解元地理分布研究

上述列举的有关直省乡试和区域举人的硕博学位论文几乎都对此做过研究。此外还有10余篇学术论文深化这一研究主题。其中以丁蓉、楚江、姜传松、刘希伟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丁蓉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在对明代南直隶举人数进行严谨考证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南直隶各府、州县、卫所、外籍、双籍和中式外地举人的分布状况，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⑥。楚江《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一文分别对清代大、中、小省举人额数做了认真统计，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清代各直省举人的时空分布情况^⑦。姜传松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明清两代江西解元与举人的地理分布及特点进行研究^⑧。刘希伟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山东乡试研究》，对清代山东举人和解元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三）举人选官制度研究

举人选官涉及中式举人出路与前途问题，是乡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金滢坤、马镛、张振国、贺晓燕等对此作过专门研究。金滢坤对中唐时期及第举人大量入藩镇幕府为僚的社会风气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深入探讨^⑨。马镛在《清代举人、贡生、监生入仕初探》一文中，对清代举人的主要入仕途径，如挑选、截取、大挑，考取内阁中书、国子监学录、官学汉教习等做了全面介绍与分析，并在《清代的举人大挑制度》中，对举人大挑这一清代主要举人选官制度的形成时间、实行原因、操作方法、实施成效及其局限性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⑩。张振国和王月针对马镛关于清代举人大挑制度论述的不足，对清代举人大挑制度前举人入仕之法、大挑举人的出路与甄别做了补充^⑪。张振国还从整体对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举人大挑的频率及其前后变化的原因^⑫。此外，贺晓燕还对清代会试落第

举人恩赏制度的背景、沿革、执行中的问题做过深入研究^⑨。

（四）乡试贡院研究

贡院作为科举时代乡会试的固定考场，是科举考试无形至公理念的有形物质存在，特别是作为科举文化的一种遗存，近年来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学术界对贡院的研究大致有两条路径。其一，对贡院进行整体研究。以刘海峰和马丽萍的成就较为突出。刘海峰在《科举学导论》一书中，辟专节对贡院的格局与规则及其所体现的至公理念进行了深入解析^⑩，并在《贡院——千年科举的背景》一文中，对贡院的形成与发展、贡院承载的科举文化和贡院遗存做了梳理和探析^⑪。马丽萍的《明清贡院建筑》一书，从建设学的视角，对贡院的源起和贡院体系的形成过程，明清贡院建筑的规划选址、配置与布局，贡院中重要单体建筑的形制特征等方面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⑫。此外，张亚群从科举文化盛衰的视角对贡院的命运沉浮也做过深入探讨^⑬。其二，对贡院进行分省研究。目前学术界对直省贡院的研究主要涉及江西、江南、广西、广东、福建、顺天、山东、湖南、陕西、河南等直省。其中，前述提到的清代江西、福建、顺天、山东、湖南乡试的硕博论文均对本省贡院有专门研究。刘海峰的《江南贡院的命运》一文，对江南贡院的历史沿革、规模体制、社会贡献、明清两代在全国的引领表率作用以及废止科举后的命运做了较深入的研究^⑭。他的《探访广东贡院明远楼》结合广东贡院明远楼的历史照片，对广东贡院的规模体制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简要介绍，并通过实地探访详细介绍了广东贡院明远楼的遗存情况^⑮。陆军和黄秀颖编著的《清代广西贡院》一书，对清代广西贡院设立前的历史文脉和设立后的历史沿革，以及以贡院为中心的乡试活动做了专门研究^⑯。田建荣的《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一文，通过历史梳理深入探讨了陕西贡院的科举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⑰。

（五）乡试解额制度研究

学术界对此研究并不多见，大陆研究则更为晚近，但研究却较为深入系统。林丽月、汪维真、郭培贵、李世愉等对此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其中以汪维真的研究较为成熟。她于 2009 年出版了《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一书，是首部系统研究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的专著。该书主要探讨了明代乡试解额的变动及其运行情况，以及云贵乡试合分与解额变动问题，分析并归纳了明代乡试解额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区域乡试解额变动的原因^⑱，并就此发表多篇学术论文^⑲。此外，林丽月和郭培贵对明代乡试解额也做过研究。林丽月对明代乡试解额的变动与乡试竞争程度的地区差异做了专门论述^⑳，郭培贵对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其举人总数做了严谨考述^㉑。李世愉对清代省域间和省域内乡试中额（相当于明代解额）的分配原则进行了系统考述，并对包括乡试在内的科举中额分配的政策导向做了独到的论述^㉒。

（六）乡试考差、命题和评卷研究

作为乡试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深入全面。李世愉的《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㉓和姜传松的《清代江西乡试研究》第二章对清代考差制度的演变过程考证严谨，对考差的功能与特点提炼精准。姜传松还在该书第二章中对清代江西考官命题原则、禁忌及其特点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在《清代江西乡试考官的命题与衡文》中对该主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㉔。侯美珍的《明代乡会试〈诗经〉义出题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明代《诗经》义命题的专著。该书系统研究了明代乡会试中《诗经》试题长短的变化、出题的分布、常见和罕见出题的诗篇，以及考官命题偏重所产生的影响^㉕。评卷是乡试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张连银、龚延明、夏卫东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典型。张连银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对明代乡会试评卷前准备工作、评卷标准、评卷方法、评卷过程等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㉖。龚延明和高明扬根据《清代朱卷集成》中朱卷文章和批语，深入研究了清代八股文的衡文标准，认为“清真雅正”是清代衡量八股文

优劣的总体要求^⑩。夏卫东从乡试同考官任命程序的缺陷和阅卷时间的限定两个角度阐释了清代乡试阅卷制度的不足^⑪。

（七）乡试舞弊与防弊研究

明清时期乡试成功便可获得举人科名，已经具备任官资格，即令不入仕为官，在社会上亦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和地位，且享有各种政治特权与经济待遇，而乡试竞争又非常激烈，故乡试作弊历来屡见不鲜，为防止乡试舞弊，防弊制度愈到后期则愈加严密。缘此，乡试舞弊与防弊常为学术界所关注。乡试作弊研究主要涉及乡试中的一般舞弊、乡试科场案和乡试冒籍三个方面。廖亚菱对乡试中的一般舞弊研究较为深入系统。他在其硕士论文《科举考试舞弊、防弊及对现代考试的启示》中，对包括乡试在内的整个科举考试前、考试中和考试后的各种舞弊手段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⑫。科场案本是乡试舞弊的一种，因其牵涉面较广，影响极大，故受到学术界特别关注。目前研究最多的是雍正四年（1726年）的江西乡试案和乾隆九年（1744年）的顺天乡试案，前者以姜传松的研究较为系统^⑬，后者胡雪艳的工作较为深入^⑭。冒籍是一种特殊的科举舞弊，因其对当代高考移民有参考借鉴价值，学术界对此研究颇多，其中以刘希伟的研究值得关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对包括乡试在内的整个清代科举冒籍现象进行了非常全面系统的研究^⑮。

就乡试防弊研究而言，目前以廖亚菱的研究较为全面，不仅对包括乡试在内的整个科举考试防弊制度进行了全面介绍，而且对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防弊措施也做了系统考察^⑯。除此以外，学术界关注最多的是乡试回避、乡试复试和乡试磨勘等防弊制度。其中，郄鹏、李世愉分别对清代前期科举整体回避制度^⑰和清代科场中的士子与考官回避制度^⑱进行了考察，姜传松也就清代乡试闱官回避与关防做了全面探析^⑲。乡试复试是防止科场舞弊的一项重要举措，邹长清对此研究颇为深入，不仅对清代乡试复试制度进行了详细考论，提出不同以往有关科举复试概念的独到见解，而且就清代翻译科与宗室乡会试复试制度也做过深入探讨^⑳。乡试磨勘是对乡试各个环节的检查，目的是为了“防弊端、正文风”，因所关綦重，清代制定了严密的磨勘条例。金木、王志明和姜传松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金木和王志明对清代乡会试磨勘制度做了简要介绍^㉑，姜传松以江西乡试为例，对清代乡试磨勘制度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考察^㉒。

（八）有关乡试研究的其他主题

乡试作为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有着广博的研究空间，除上述研究主题外，目前学术界还对乡试分闱、乡试经费、宗室乡试、乡会试同年齿录，以及乡试对士人心态影响等方面进行过专门研究。关于乡试分闱，高淑兰和陈尚敏分别对湖广和陕甘分闱的始末及其原因进行了详细论述和探析^㉓；在乡试经费方面，刘希伟的《清代山东乡试经费初探》以清代山东乡试为例，对乡试考官路费银、乡试科场经费银、地方宾兴资助银、举人旗匾银、鹿鸣宴用银等有关乡试经费进行了系统考察^㉔；在宗室乡试方面，汪维真的《明代宗室乡试中式政策探析》一文，对明代宗室乡试中式政策实施的原因、酝酿过程、推出与实行以及调整与变动情况进行了全面探析^㉕；在乡会试同年齿录方面，马墉的《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一书，对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的源流与体例、传纪史料、家族史料、社会史料、教育与科举考试史料以及与乡会试相关的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㉖。在乡试对士人心态影响方面，尹芳芳就元代乡试对浙江行省士子心态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探讨^㉗。何欢在《清代乡试中的落第士子》一文中，对清代乡试中的落第士子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研究^㉘。此外，石焕霞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为中心，系统考察和探析了科举废止前后士人的心态状况^㉙，对清末最后一科乡试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三 乡试研究的趋势与走向

近一个世纪以来，乡试研究同科举研究一样，经历一个从冷寂逐渐走向热门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乡试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发展趋势：

（一）未来乡试研究将更加蓬勃繁盛

之所以说未来乡试研究将更加蓬勃繁盛，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其一，乡试在帝制中国后期的影响巨大。作为省一级的考试，乡试与区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在科举系统中是影响最大一级考试。明清社会通常所说的“科举”经常是指乡试，特指的“科举”便是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①。乡试中式者明代以后称为举人，是仅次于进士的固定科名，也是一种特定身份地位的出身，已经具备了入仕的资格。举人“即会试不第，亦不必再应乡举，而并可依科就选”^②。清代举人达到一定的年限后，还可参加“举人大挑”入仕担任县一级的官员。然因获得举人科名便意味着成为中高级士绅，不仅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③，且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与经济待遇^④，因此一些举人终身没有参加会试和殿试。又因进士录取名额有限且朝廷所需官员较之举人额数为少，因而大量举人并未入仕任官，长期居于乡间，讲学属文，表率乡里，对地方政治之推移、社会之嬗变、风俗之教化，莫不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无论举人入世为官，抑或远居乡间，对朝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其二，有关乡试研究的史料丰富。由于乡试是一省范围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考试，向为各直省所重视，因其关系重大，典籍制度与举人行为事迹，官方、私人多有记载，故现今存世的文献典籍非常丰富。例如，据美国学者艾尔曼（B. A. Elman）在《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一书中搜集统计，现存 1148 年至 1904 年间文科各类科举录达 1042 种，其中，明清两代存世的各省乡试题名录分别为 324 种和 623 种^⑤，占总数的十分之九强。尽管艾尔曼对现存科举录搜集已经相当丰富，但由于搜寻范围多限于世界著名大图书馆，基本上未包括中国大陆许多大学图书馆和省市图书馆及民间的收藏，因而实际上还有不少乡试录未包含在内^⑥。此外，还存有不少武举乡试录、乡试朱卷以及记载乡试人物行为事迹的笔记、小说、戏曲等科举文献资料。如 1992 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就收集 8000 余份乡会试朱卷，其中乡试朱卷达 5200 多份。这些朱卷为考证乡试人物的籍贯、族属、生年，尤其是研究科举家族与区域科第文风的盛衰关系，社会阶层流动等提供了绝好的资料来源。正因为乡试资料的大量存世，才使得乡试的系统研究得以实现，同时也是乡试研究一直活跃并持续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三，乡试具有足资借鉴的研究价值。乡试在明清社会是一项规模庞大的且持久的考选活动，与现代大规模考试有着诸多相似特征，很多方面可为现代考试所借鉴。其中与乡试最为相似的现代考试是当今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明清时期乡试实行的分区定额制度，其实是当今高考分省招生录取制度的历史源头。这种录取制度在明清社会带有照顾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客观上有利干边远和落后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当今高考实行分省录取制度正是对乡试分区定制的承继与发展，因此当前高考分省录取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历史上乡试分区定额制中得到借鉴和启发。如借鉴乡试分区定额制中基于区域公平的考虑，对边远和落后地区照顾的做法，借鉴以人口之多寡作为乡试中额之确定的重要因素，可以对人口大省和农村地区，以及一些省域内文化落后地区实施照顾性政策。又如，乡试中采用立法的方式防止考试作弊，乡试活动中礼仪制度等，都对现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直省乡试研究将进一步拓展

自元代起开创了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模式，明清两代因而袭之，500多年间虽屡有损益，但作为科举考试层级中具有取士性质的一级考试^⑦，遂成为定制。元代乡试分11行省、2宣慰司、4直隶省分，共有17个省级乡试单位。明代分南北直隶、江西、浙江、福建、河南、山东、四川、陕西、山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5个省级乡试单位，有15处乡试考场。清代将南直隶划分为江苏和安徽二省，有清一代二省乡试一直合闱。雍正二年湖广实行分闱，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实行分闱。清代共有18个省级乡试单位，有17处乡试考场。如此算来，元明清三代共有51个断代的省级乡试单位可供研究。

元明清三代乡试虽在基本制度规定上全国有着统一的要求，但由于乡试为各直省举办，而直省间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各直省表现出诸多差异，特别是涉及与之相关的乡试活动，这种差异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以直省为单位对乡试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但可以深化和细化科举史研究，推进科举学向纵深发展，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科举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研究，尤其是对充实地方科举史、考试史和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直省乡试和区域举人的研究非常活跃，迄今为止，已有多篇硕博论文对之做了系统研究。就直省乡试来看，目前主要对清代江西、福建、顺天、河南、贵州、山东、湖南7直省和元代江浙行省做了系统研究。此外，李世愉对江南乡试在清代科举中的地位做了专门探讨。就区域举人而言，研究主要涉及明清浙江省、明代南直隶和河南开封府。就研究现状而言，学术界仅对清代7直省乡试做过系统研究，还没有学者对明代直省乡试进行过系统探讨，相对于上述51个断代省级乡试单位，直省乡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后的乡试研究不仅可以直省为单位对某一断代的乡试进行探讨，也可以就某直省乡试做通史研究，还可以对直省乡试的某一方面做专题性研究。既可从制度史和活动史的视角展开研究，又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切入。总之，直省乡试研究的空间很大，今后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成为乡试研究乃至整个科举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

（三）制度研究和问题探讨将继续深入

如前所述，萌芽期的乡试研究数量有限，且多为史实的回忆和事实的描述。如齐如山1956年在台湾出版的《中国的科名》，多是作者作为科举时代的过来人，对自己所见所闻进行的详细描述。商衍鎏1956年在大陆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书中关于乡试也有相当内容是作者作为末科探花，对自身科场经历的回忆和描述。贾景德1966年在香港出版的《秀才·举人·进士》一书，主要是作者作为清末进士回忆科场旧事的一本小册子。事实描述方面，如吴晗的《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一文，对明代秀才参加乡试的整个考试过程及中举后的社会效应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

进入乡试研究的发展期，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多数研究依然为史料的整理与考证、史实的回忆和描述，制度考释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但是这些成果多数是在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研究时涉及乡试研究，研究仍以制度考证为主，不过已经出现有关直省乡试的实证研究和与乡试直接相关的专题研究。

实证研究方面，如刘海峰和庄明水主编的《福建教育史》，对元代福建乡试中式人数和第一名人数，明清福建乡试中额的演变及在全国的位次、历科福建举人数和解元数，以及清代福建乡试考官做了严谨的考证和统计，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后来的乡试研究影响很大，之后直省乡试关于举人的地理分布研究对此均有借鉴。专题研究方面，如汪维真的《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对明代乡试解额制度进行了系统探讨。该书注意引入“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

式”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的研究理念^①，对明代乡试解额的变动及其运行情况，以及云贵乡试合分与解额变动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明代乡试解额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区域乡试解额变动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又如，刘希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研究》，通过清代科举冒籍对当代高考移民和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问题进行反思和关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该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乡试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乡试问题研究，不再局限于制度史的考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夏卫东的《清代乡试阅卷的制度缺陷》，从清代乡试同考官任命程序缺陷和阅卷时间限定两个角度，对清代乡试阅卷制度的不足进行深入阐释。

作为帝制中国后期的一种稳定且健全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制度史的研究是乡试研究的主要范畴，并且由于目前乡试研究尚处于发展时期，有关乡试的许多制度还有待进一步考释。但是乡试不单纯是制度史问题，因为自明清社会以来乡试影响非常广泛，几乎渗透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所以对乡试进行研究应该超出制度史的范围，兼对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②以来，乡试作为科举学重要研究领域的客观特征，要求今后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制度史层面，还应该关注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层面的问题探讨。目前虽然有关乡试与社会关系问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多，未来乡试研究仍将进行制度史研究，但相信在制度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这方面的研究必将成为乡试研究乃至整个科举学新的研究增长点，乡试制度研究和问题探讨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注释：

- ①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5页。
- ②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年版。
- ③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国民政府考试院1936年印行。
- ④⑥⑩⑪⑫参阅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285—296、44页。
- ⑤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
- ⑥张晋藩、邱远猷编：《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1964年版。
- ⑦吴晗：《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见吴晗：《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4—97页。
- ⑧Li chow chung—cheng. *L'exam provincial en chine (iang che) sous la dynastie des Ts'ing (de 1644—1911)*, Paris: Jouve&Cie. 1935.
- ⑨齐如山：《中国的科名》，台湾新闻出版公司1956年版。
- ⑩沈兼士编著：《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三文出版社1960年版。
- ⑪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年版。
- ⑫刘兆琰：《清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版。
- ⑬贾景德：《秀才·举人·进士》，香港自由人报社1966年版。
- ⑭Adam Yuen—Chung Lui: *Syllabus of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hsiang—shih) under the Early Ch'ing (1644—179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8, No 3, 1974, pp. 391—396.
- ⑮（日）宫崎市定：《科舉》，秋田屋1946年版；《科舉——中國の試験地獄》，日本中央公論社1963年版。
- ⑯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
- ⑰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 ⑱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⑲李铁：《科场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 ⑳魏秀梅：《清代科举回避制度，1645—1906——以文场乡会试为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6期，第23—25页；魏秀梅：《清代之乡试考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5年第24期，第172—182页；李国荣：《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科场案概述》，《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第108—113页；张书才、李国荣：《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乡试贿卖举人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第22—28页；李治安：《元代乡试新探》，《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第156—164页。

- ②相关研究依次为：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年；刘一彬《闽台交融的考试纽带：清代福建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年；张森《清代顺天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年；赵娜《晚清顺天乡试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年；程伟《清代河南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年；田书清《清代贵州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年；李世愉《江南乡试在清代科举中的地位》，《科举学论丛》2014 年第 2 辑，第 22—27 页。刘希伟《清代山东乡试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年；许静《清代湖南乡试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尹芳芳《元代江浙行省乡试初探》，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年。
- ③相关研究依次为：丁蓉《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申礼《明代河南开封府举人辑略》，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王红春《明代浙江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年；程小丽《清代浙江举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年。
- ④相关研究依次为：庄明水、刘海峰《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5—217 页；刘海峰《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 6 期，第 68—77 页；杨齐福《清代台湾举人之概论》，《台湾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60—64 页；杨齐福《清代台湾举人之概论》，《台湾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60—64 页；杨齐福《试论清代台湾举人之诗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86—94 页。
- ⑤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⑥上述论文依次为：《明代南直隶各府举人的地理分布》，《学术探索》2011 年第 5 期，第 94—97 页；《明代南直隶举人人数考》，《科举学论丛》2012 年第 1 辑，第 35—41 页；《明代南直隶各县举人地理分布的考察》，《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第 120—125 页。
- ⑦楚江：《清代举人额数的统计》，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年。
- ⑧姜传松：《清代江西举人的地理分布及特点——明清比较的视角》，《教育与考试》2010 年第 6 期，第 40—44 页。
- ⑨相关研究为金滢坤：《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影响》，《文化学刊》2008 年第 6 期，第 96—104 页；《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 期，第 126—133 页。
- ⑩马墉：《清代举人、贡生、监生入仕初探》，《科举学论丛》2011 年第 1 辑，第 46—51 页；《清代的举人大挑制度》，《历史档案》，2011 年第 1 期，第 66—75 页。
- ⑪张振国、王月：《再论清代的举人大挑制度》，《历史档案》2012 年第 2 期，第 70—76 页。
- ⑫张振国：《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史学月刊》2012 年第 10 期，第 130—132 页。
- ⑬贺晓燕：《试论清代年老落第士子恩赏制度》，见胡凡：《黑水文明研究》第二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5—266 页。
- ⑭刘海峰：《贡院——千年科举的背景》，见刘海峰、郑若玲：《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8—167 页。
- ⑮马丽萍：《明清贡院建筑》，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 ⑯张亚群：《科举文化盛衰与贡院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6 期，第 86—92 页。
- ⑰刘海峰：《江南贡院的命运》，《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6 期，第 79—85 页。
- ⑱刘海峰：《探访广东贡院明远楼》，《科举学论丛》2008 年第 1 辑，第 76—85 页。
- ⑲陆军、黄秀颖：《清代广西贡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 ⑳田建荣：《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第 1—6 页。
- ㉑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 ㉒上述论文按发表时间依次为：《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0 期，第 125—127 页；《明万历四十三年乡试解额之变动》，《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2 期，第 121—124 页；《明洪熙、宣德间乡试解额制度的确立与运行》，《史学月刊》2009 年第 8 期，第 35—44 页；《明洪武三年乡试解额献疑》，《江汉论坛》2009 年第 2 期，第 68—75 页；《明代云贵乡试合分及其解额变动研究》，《明史研究》2010 年版，第 222—264 页。
- ㉓林丽月：《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2 年第 20 期，第 43—73 页。
- ㉔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 年第 1 期，第 47—52 页。
- ㉕李世愉：《清代科举中额的分配原则及政策导向》，《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3 期，第 122—133 页。
- ㉖李世愉：《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第 11—17 页。
- ㉗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1—101 页；《清代江西乡试考官的命题与衡文》，《科举学论丛》2010 年第 1 辑，第 42—50 页。
- ㉘侯美珍：《明代乡会试〈诗经〉义出题研究》，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 2014 年版。

- ⑩张连银：《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年。
- ⑪龚明延、高明扬：《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第 176—191 页。
- ⑫夏卫东：《清代乡试阅卷的制度缺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第 84—87 页。
- ⑬⑭廖亚菱：《科举考试舞弊、防弊及对现代考试的启示》，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年，第 10—20、21—33 页。
- ⑯相关研究为：《查嗣庭案与清代江西乡试》，《科举学论丛》2009 年第 1 辑，第 15—24 页；《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年，第 144—160 页。
- ⑮胡雪艳：《乾隆九年顺天乡试案研究》，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年硕士学位论文 2003 年。
- ⑯刘希伟：《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 ⑰郑鹏：《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版）》2004 年第 1 期，第 31—36 页。
- ⑱李世愉：《清代科场回避述略》，《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 5 期，第 211—214 页。
- ⑲姜传松：《清代乡试闱官回避与关防探析》，《文化学刊》2010 年第 1 期，第 93—98 页。
- ⑳相关研究依次为：《清代乡试复试考论》，见刘海峰、郑若玲：《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6—532 页；《清代翻译乡会试复试制度研究》，《历史档案》2011 年第 2 期，第 45—55 页；《清代宗室乡会试覆试制度研究》，见刘海峰、朱华山：《科举学的拓展与深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6—394 页。
- ㉑金木：《清代科举会试前的磨勘与复试》，《中国高校招生》2001 年第 1 期，第 61—62 页；王志明：《清代乡会试的磨勘、复试与举人罚科》，《历史档案》2009 年第 4 期，第 73—84 页。
- ㉒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48 页。
- ㉓相关研究为高淑兰：《清代湖广“南北分闱”考析》，《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第 228—229 页；陈尚敏：《晚清陕甘分闱述论》，《历史档案》2012 年第 4 期，第 81—86 页。
- ㉔刘希伟：《清代山东乡试经费初探》，见刘海峰、郑若玲：《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533—554 页。
- ㉕汪维真：《明代宗室乡试中式政策探析》，见《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645—653 页。
- ㉖马镛：《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版。
- ㉗尹芳芳：《元代乡试对江浙行省士人心态的影响》，《才智》2011 年第 21 期，第 318 页。
- ㉘何欢：《清代乡试中的落第士子》，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年，第 20—22 页。
- ㉙石焕霞：《20 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 1902 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考试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104—117 页。
- ㉚刘海峰：《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第 21—23 页。
- ㉛赵翼：《陔余丛考》卷 28《举人》，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582 页。
- ㉜请参阅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 ㉝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627—640.
- ㉞就清代河南乡试来看，据笔者统计，有 14 科乡试录和 6 科乡试题目录，还有部分乡试齿录和乡试同年全录，并不在艾尔曼统计范围之内。
- ㉟㉟汪维真：《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17、23 页。
- ㉟刘海峰于 1992 年在《“科举学”刍议》一文提出建立“科举学”的构想，并于 1994 年和 1999 年分别发表《“科举学”的发凡》《“科举学”的世纪回顾》等有关“科举学”构建的论文后，于 2005 年出版《科举学导论》一书，他在该书中指出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该书的出版被学术界视为科举学形成的标志。

【项目说明】本文系天津市 2017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天津市高考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JJXQN17-002。

（作者程伟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邮编 300354）

（责任编辑 哈恩忠）